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176(2022)01-074-(13)

我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格局的 转折性变化: 2000—2020 年*

吴瑞君 薛琪薪 罗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241)

摘要: 通过历次人口普查和相关统计资料分析发现, 2000—2020 年间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空间格局已经发生转折性变化。以 2010 年为界, 中西部人口向东部迁移的净增量已由波浪式推高转变为波浪式回落, 省际之间的流动人口增长明显减缓, 乡城转移的人口年龄红利逐渐消逝, 城乡老龄化程度双双增长。其重要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速度反超东部。进一步分析发现: 我国人口与经济区域均衡发展初露端倪, 人口空间格局新变化使区域均衡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 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奠定了我国人口发展区域均衡的大格局, 未来我国人口空间格局的东西变化仍将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内部的东部沿海与内地之间。

关键词: 人口迁移; 城镇化; 空间格局转变

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人口迁移的发展态势引人瞩目, 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与新中国头 30 年相比,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模式发生了重大的逆转性变化^[1]。基于 1990—2010 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小普查资料, 不同学者已经对我国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省际人口迁移发展态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2][3][4][5]}。研究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总体上表现为由中西部迁往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态势, 且这一“向东流”呈现出“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态势。

然而, 人口东迁不可能永远“一浪高过一浪”, “潮涨终有潮落时”^[6]。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空间格局的变化趋势已经悄然发生逆转, 并率先引起了一些财经媒体的关注, 如第一财经、搜狐网等刊载的文章“人口流向逆转带来什么变化”^[7]“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的新格局”^[8]“中国人口大迁移, 在 2017 年已发生巨大转折”^[9]等。对于 2010 年以后我国人口迁移空间格局出现的新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790008)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21-01-25

作者简介: 吴瑞君 女(1963—)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薛琪薪 男(1986—)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罗志华 男(1994—)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变化, 学界特别是人口学领域对此的关注和深入探讨还相对较少。本文主要利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以及常规的人口统计资料, 对 2010 年前后我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空间格局发生的转折性新变化进行实证分析。文中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 与我国经济带的划分相同^①。

一、转折性变化的具体表现

(一) 以 2010 年为界, 中西部人口向东部迁移的净增量已由波浪式推高转变为波浪式回落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小普查各省份 5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于普查时 5 年前的常住地调查数据, 可以推算普查时前 5 年内各省份的省际迁移人口。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净迁移量, 1985—1990 年间仅约 240 万人 (时期末 5 岁及以上人口于时期内的迁移, 下同), 2000—2005 年和 2005—2010 年间已经分别高达 2315 万人和 3183 万人, 但 2010—2015 年间却急转直下地跌落为 2219 万人, 2015—2020 年间进一步下降为 1952 万人 (见图 1)。这表明伴随我国地区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中西部地区的“抢人大战”, 尽管东部地区对人口和人才的吸引力依旧强劲, 但中西部地区的吸引力也在持续提升。从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净迁移量来看, 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净迁移量始终为负向增长, 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的人口流失比较严重。值得注意的是, 2015—2020 年间, 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净迁移量出现了由大幅减少转向微弱减少的转折性变化, 这与我国近年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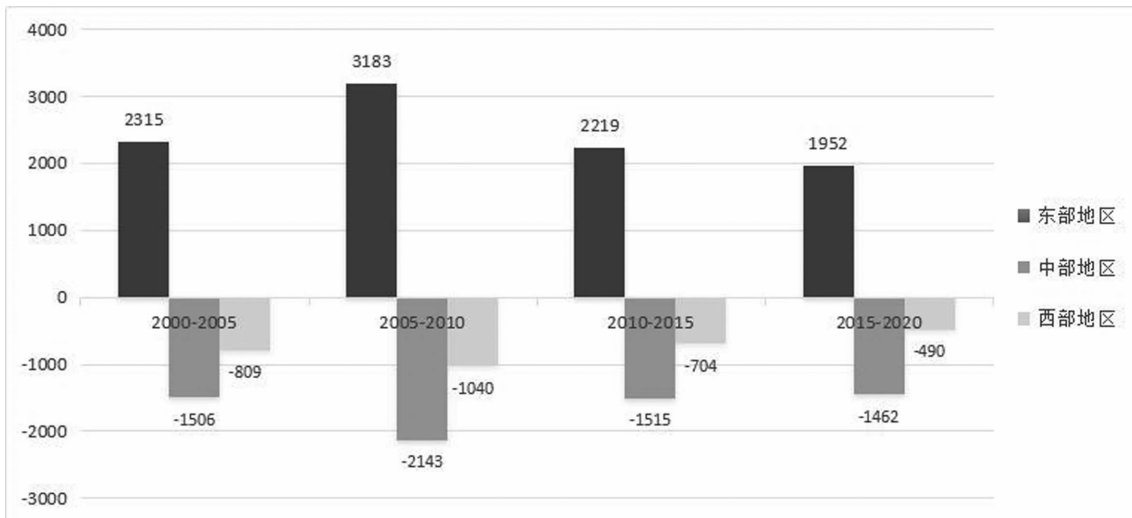


图 1 2000—2020 年间东中西部地区的净迁移规模 (万人)

从表 1 的四时期三地带之间的净迁移看, 东中西部地区均表现为中、西部迁往东部, 以中部迁往东部为主流; 中部大量迁往东部, 少量迁往西部。2005 年前后两个时期相比较, 东部净迁入量增加了 37.49%, 中、西部净迁出量分别增加了 42.30%、28.55%; 中、西部向东部的净迁出了分别增加了 39.75%、33.61%; 中部向西部的净迁出量增加了 130.95%。2010 年前后两个时期相比较, 东部净迁入量减少了 30.29%, 中、西部净迁出量分别减少了 29.30%、32.31%; 中、西部向东部的净迁出量分别减少了 29.91%、30.96%; 中部向西部的净迁出量减少了 16.49%。而 2015 年以后, 中西部向东部的净迁移量减少的这种趋势更加明显。由此可见, 四时期三地带之间净迁移转增为减的变化幅度, 以中—西流向最为明显。

表1 2000—2020年各时期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净迁移人口（万人）

		净 迁 入			
		合计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0—2005年 a	东部	2315	—	1464	851
	中部	-1506	-1464	—	-42
	西部	-809	-851	42	—
2005—2010年 b	东部	3183	—	2046	1137
	中部	-2143	-2046	—	-97
	西部	-1040	-1137	97	—
2010—2015年 c	东部	2219	—	1434	785
	中部	-1515	-1434	—	-81
	西部	-704	-785	81	—
2015—2020年 d	东部	1952	—	1357	595
	中部	-1462	-1357	—	-105
	西部	-490	-595	105	—

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2010年、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2015年、2019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推算结果对应于各地区年末人口统计数据，如无特殊说明，下表同。

（二）2010年以来我国省际之间的流动人口增长明显减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迁移主要表现为不改变户籍的人口流动。对此，虽然受资料所限，尚难确切区分迁移人口中的户籍与非户籍迁移，但可通过相关数据的分析来说明。2000—2015年间，在全国人口净增量中，省际流动人口的净增量占51.27%；在东部地区常住人口（东部各省份常住人口之和）增量中，省际流入人口（东部各省份来自全国其他省份的流入人口之和）的增量占55.79%；在中、西部地区户籍人口（地区各省份户籍人口之和）增量中，省际流出人口（地区各省份户籍人口流往全国其他省份的人数之和）的增量分别占73.66%、63.76%。2015—2020年间，尽管省际人口流动的主要流向还是中、西部地区流往东部地区，但这种流速开始放缓，甚至出现了部分人口回流西部的现象。此外，上述各地区的人口增量还包括自然增长，所以，东部地区的常住人口净迁入总量中省际流入人口的增量占比在五成以上，而中、西部地区的户籍人口省际流出增量，可能还会大于其户籍人口的增长总量。

表2报告的是东、中、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省际流动人口增长变化情况，除2000—2005年间中部地区的省际流入人口有所减少外，2000—2020年间三地带的省际流入或流出人口总体上呈持续增长态势。但四时期的增幅变化较大：2005—2010年是明显的高增长时期，而2010—2020年间的增幅则明显缩减。2010年前后两个时期相比较，东部地区的省际流入人口和中、西部地区的流出人口增幅分别由86.35%、77.79%、73.16%，下降到8.40%、8.86%、8.51%；东部地区的净流入量增幅由81.33%下降到1.94%，中、西部地区的净流出量增幅分别由73.53%、

100.58%, 下降为 2.55%、0.64%。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人口主流向与上述迁移格局基本一致: 中、西部流向东部, 中部主要流向东部同时也有少量流向西部。2010 年以后, 中西部净流出增幅大幅缩减, 既是因为新增流出人口减少, 也是因为过去流出人口返流的增加以及建制镇和中小城市落户限制放宽后, 部分流动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所导致。

表 2 2000—2020 年省际流动人口的增长变化 (万人)

		省际 流入	省际 流出	净 流 入			
				合计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0 年	东部	3316	756	2560	—	1628	932
	中部	328	2028	-1699	-1628	—	-71
	西部	598	1458	-861	-932	71	—
2005 年	东部	3774	791	2983	—	1915	1068
	中部	263	2386	-2123	-1915	—	-208
	西部	743	1602	-860	-1068	208	—
2010 年	东部	7033	1624	5409	—	3499	1910
	中部	558	4242	-3684	-3499	—	-185
	西部	1048	2774	-1725	-1910	185	—
2015 年	东部	7624	2110	5514	—	3591	1923
	中部	840	4618	-3778	-3591	—	-187
	西部	1274	3010	-1736	-1923	187	—
2020 年	东部	8624	1524	7100	—	3784	3316
	中部	3416	7694	-4278	-3784	—	-494
	西部	1839	4661	-2822	-3316	494	—

注: 因国家统计局和西藏自治区统计局 2020 年人口普查资料未公布西藏地区的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情况, 故推算的西部地区流动人口不包含西藏地区。

(三) 2010 年以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速度反超东部

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区域之间的人口迁移流动, 主要表现为跨区域的农村人口城镇化转移。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速度的区域差异,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口迁移流动的空间格局。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未变, 但是, 进入 21 世纪之后, 经济增

长和城镇化速度的区域差异却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

根据表3,从三地带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变化看,在2000—2005年间,东部地区GDP占比提升了2.34%,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GDP占比则分别下降2.14%和0.20%;而在2005—2015年间,这种占比情况发生了转折,东部地区的GDP占比转升为降,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的GDP占比则转降为升;在2015—2020年间,东部地区GDP占比的下降趋势有所减弱,而中西部地区GDP占比的增长趋势同样放缓。就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而言,在2000—2005年间分别提高了8.63、5.62、5.27个百分点,在2005—2010年间分别提高了8.63、5.62、5.27个百分点,在2010—2015年间分别提高了4.88、6.84、7.16个百分点,而在2015—2020年间则分别提高了4.38、7.95、4.5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的城镇化速度趋于减缓,而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速度则趋于加快。在2000—2005年间,城镇化速度东部最快、西部最慢;2010—2015年间逆转为西部最快、东部最慢;2015—2020年间进一步逆转为中部城镇化速度最快、东部最慢。

表3 2000—2020年东中西部三地带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和城镇化率变化^② (%)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00—2005	2005—2010	2010—2015	2015—2020
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全国	100	100	100	100	100				
	东部	57.29	59.63	57.31	55.57	54.41	2.34	-2.32	-1.74	-1.16
	中部	25.58	23.44	24.06	24.36	24.52	-2.14	0.62	0.30	0.16
	西部	17.13	16.93	18.63	20.07	21.07	-0.20	1.70	1.44	1.00
城镇化率	全国	36.22	42.99	49.95	56.10	63.89	6.77	6.96	6.15	7.79
	东部	44.15	52.78	59.56	64.44	68.82	8.63	6.78	4.88	4.38
	中部	33.07	38.69	44.92	51.76	59.71	5.62	6.23	6.84	7.95
	西部	28.94	34.21	41.19	48.35	52.86	5.27	6.98	7.16	4.51

根据推算^③,在东中西部地区,四时期全国乡—城人口净转移规模分别为8865、9072、7940、9563万人(见表4),总的趋势是先增后减,然后再增,呈现出波动变化;东部地区城镇的净迁入和农村的净转出口数量2000—2015年间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2015—2020年间有所回升;中部地区的城镇净转入人口在2000—2010年间先减少,而2010—2020年间则持续增加,农村人口净转出表现出与此相反的趋向,即前十年增加后十年减少;西部地区的城镇净转入人口自2000年以来不断增大,增幅先大后小,而农村的净转出则呈现先增后降的变化。从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来看,东南半壁的城镇人口净迁移在2000—2020年间呈现出先增后减再增的趋势,而农村地区的人口净迁移也表现出了类似的特征;西北半壁的城镇和农村人口净迁移量在过去20年间均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这说明,2010年前后的两个十年,中西部地区城镇吸纳本地区农村人口的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农村人口跨区域外流的强度也有所不同,这是导致中西部地区人口净迁出量波动变化的直接原因。

表4 2000—2020年东中西部三地带城乡人口的净转移量推算 (万人)

	2000—2005年		2005—2010年		2010—2015年		2015—2020年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全 国	8865	-8865	9072	-9072	7940	-7940	9563	-9563
东南半壁	8409	-8406	8570	-8580	7451	-7420	8725	-8725
西北半壁	456	-459	501	-491	488	-520	838	-838
东部	5405	-3089	5287	-2120	3906	-1685	4768	-4768
中部	1829	-3332	1775	-3907	1986	-3503	2657	-2657
西部	1632	-2444	2011	-3046	2048	-2751	2138	-2138

(四) 乡—城转移的人口年龄红利逐渐消逝, 城乡老龄化程度双双增长

从人口迁移流动对流入与流出地的年龄结构差别效应看, 在流入地的某个比例指标高于流出地的情况下, 从流出地到流入地的转移 (可以称之为顺向流动) 不可能对流入与流出地的该项指标同时起到抬升效应; 而在流入地的某个比例指标低于流出地的情况下, 这种转移却有可能对流入与流出地的该项指标同时起到抬升效应。乡—城转移人口一直以劳动年龄特别是青壮年为主, 但其占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我们根据历次人口普查 (包括小普查) 城乡年龄别死亡率等资料, 推算了乡—城净转移人口的年龄结构, 如表5所示。从劳动年龄占比来看, 15—64岁年龄段的占比一直保持“城高乡低”, 而乡—城转移人口中15—64岁年龄段的占比在2000—2005年、2005—2010年两个时期比城镇或农村更高, 但2010—2015年、2015—2020年两个时期的占比则比城镇或农村更低。不难发现, 转移对城镇和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分别起到了抬升和下降效应, 但2010—2020年间, 乡—城转移人口中的劳动年龄段占比已经转变为介于城乡之间 (比较接近于乡), 因此转移对城乡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双双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效应。这种双向的下降效应虽然尚属微弱, 但却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 乡—城转移人口的年龄结构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年轻, 乡—城转移给城镇带来的年龄结构红利已悄悄地消逝。

表5 2000—2020年四时期分城乡和乡—城转移人口的年龄结构 (%)

	0—14岁			15—64岁			65岁及以上		
	农村	城镇	转移	农村	城镇	转移	农村	城镇	转移
2000—2005年	20.37	15.45	16.77	71.47	76.79	77.55	8.16	7.76	5.68
2005—2010年	19.04	14.55	15.42	70.39	75.42	80.85	10.57	10.02	3.73
2010—2015年	19.60	13.67	21.65	69.04	76.78	71.57	11.36	9.55	6.77
2015—2020年	19.18	14.40	17.9	68.92	76.47	71.53	11.90	9.13	10.57

注: 由于2020年国家 and 地方七普数据均未公布城乡地区分年龄的人口数, 故采用2019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进行替代推算。

从城镇、农村和乡—城转移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来看,整体上表现出“乡高城低”的趋势,而乡—城转移人口中的老年人比例通常低于农村,因此这种转移对城、乡老龄化分别起到了缓解和加深效应。在2000—2020年的20年里,全国乡—城转移人口中65岁及以上占比先降后升,即由2000年的5.68%降为2005年的3.73%再上升至2015年的10.57%,乡—城转移对城镇老龄化的缓解效应呈现出明显的波动变化。也就是说,伴随时间推移,乡—城转移人口中的老年人比例提高到了介于城乡之间,乡—城转移将会对城乡老龄化同时起到一定的抬升效应。一直以来,我国许多大城市依靠替代迁移来缓解老龄化,今后或将不可持续,这些都将成为区域和城乡人口均衡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显然,在流入地的某个比例指标高于流出地的情况下,只有从流入地到流出地的逆向转移,才有可能对流入与流出地的该项指标同时起到抬升效应,其条件为:转移人口的该指标介于流入与流出地之间。我国人口的东西流动是双向的,2010年前后中西部人口向东部地区的净迁移转为减,是顺向转移减少和逆向回返转移增加的综合结果。可以认为,返乡农民工的总体素质,基本上应该介于东部大城市与回返的中西部家乡之间,农民工的回返转移,可以对流入与流出地的人口素质同时起到不同程度的抬升效应。其实,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率先升级的情况下,其向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结构水平基本上也介于东西部之间,因此这种产业转移对东西部的产业结构也会同时起到一定程度的抬升效应。农民工返乡和产业转移,也给区域均衡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挑战。

二、对转折性变化动因的探讨

(一) 人口东移浪潮的返流加大,中部和西南地区人口占比转降为升

我国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变化,必然也会反映于胡焕庸线两侧的东南与西北两大半壁之间。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将基本位于胡焕庸线西侧的内蒙古、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6个省区视为西北半壁,将其他25个省区市视为东南半壁。我国大陆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半壁。由表6可见,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2000—2010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西北半壁占比提高了0.79个百分点,东南半壁占比呈下降趋势;2010—2020年,西北半壁的内生产总值呈现先略微下降后上升的趋向,而东南半壁则相反,即先上升后下降。从城镇化率来看,东南半壁的城镇化速度在2010年后开始放缓,而西北半壁的城镇化速度则明显加快,并逐渐接近东南半壁。尤其是2015—2020年间,西北半壁省份的城镇化率达到58.29%,与东南半壁省份的城镇化率(62.01%)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从人口分布看,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的人口分布具有波动性,东南半壁的人口分布比例2000—2010年间先是略有下降然后有所回升,2010—2020年间则先开始下降又略有回升;而西北半壁的人口分布特征则与此相反。需要指出的是,与东南与西北两大半壁之间经济增长和城镇化速度差异的变化相比,人口分布比例的变化几乎微不足道:相对东南半壁内部的东部沿海地带与内地(中部和西南6个省份)人口—经济有关指标的变化幅度而言,东南与西北两大半壁的变化幅度明显较小。与我国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人口迁移流动的“洪流”相比,东南与西北两大半壁之间的迁移流动只是“涓涓细流”^[10]。未来我国人口东西分布的变化很可能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的东部沿海与内地之间。2010年前后,虽然西北地区的人口占比转降为升,但是,其转降为升的变化幅度远低于中部和东南部降幅减少的变化幅度。如果将东部地区人口占比上升趋缓视为趋向均衡分布的表现,那么,中部和西南地区人口占比下降趋缓对均衡分布的贡献率分别为34.18%和60.13%,而西北地区人口占比转降为升的贡献率只有5.70%。这就意味着,我国人

口东西分布的未来变化很可能将会主要表现为中部和西南地带的人口占比转降为升, 西北半壁的人口占比可能继续有所上升, 但其升幅相当有限。

表 6 我国东南与西北两大半壁的人口经济若干指标 (%)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2000—2005 年	2005—2010 年	2010—2015 年	2015—2020 年
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全国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	—	—	—
	东南半壁	96.01	95.78	95.22	95.36	95.16	-0.23	-0.56	0.14	-0.20
	西北半壁	3.99	4.22	4.78	4.64	4.84	0.23	0.56	-0.14	0.20
城镇化率	全国	36.22	42.99	49.95	56.1	63.89	6.77	6.96	6.15	
	东南半壁	36.51	43.37	50.41	56.57	62.01	6.86	7.04	6.16	5.44
	西北半壁	32.13	37.64	43.40	49.39	58.29	5.51	5.76	5.99	8.90
人口分布比例	全国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	—	—	
	东南半壁	93.50	93.45	93.47	93.40	93.50	-0.05	0.02	-0.07	0.10
	西北半壁	6.50	6.55	6.53	6.60	6.50	0.05	-0.02	0.07	-0.10

(二) 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调整, 人口空间格局的均衡发展初露端倪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完成了从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协调发展的转变^[11], 这一转变必然会对我国人口的空间格局带来深刻的影响。如前所述, 2005 年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开始反超东部地区的时间节点, 同时也是西部地区城镇化速度开始反超东部地区的时间节点; 2010 年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化速度全面反超东部地区的时间节点, 同时也是东部地区人口净迁入和中、西部地区人口净迁出规模大幅跌落的时间节点。

根据表 7, 从 2000—2020 年间我国人口迁移分布的变化来看, 东部地区的人口占比一直是提高的, 四个时期的提高幅度分别为 0.52、1.82、0.25、1.49 个百分点, 即先增后减然后再增; 四个时期中部地区的占比一直是下降的, 其降幅分别为 0.40、0.83、0.29、1.57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的占比在前两个时期分别下降了 0.12、0.99 个百分点, 而在 2010—2015 年、2015—2020 年间则分别提高了 0.05、0.07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2010 年前后相比较, 发生了东部地区人口占比增幅和中部地区人口占比降幅明显缩减、西部地区人口占比转降为升的重要转变。尽管变化幅度尚属微小, 但转变拐点已经到来。可以认为, 在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转变的背景下, 我国人口空间格局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方向的转变也已初露端倪。

同时也要看到, 我国人口空间格局已经显现的变化有着多方面的经济社会起因和后果。毋庸置疑, 近些年来我国中西部人口向东部地区净迁移明显放缓, 与农民工返乡回流有关。许多农民工返乡回流, 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提速的拉力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

放缓、产业结构率先升级、城市转型加快发展的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主要表现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他们在流入地的失业。如图2所示，自2000年以来的20年间，全国多个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波动下降，尤其是一些东部地区如天津、山东等老牌经济强市强省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现出了下降趋势，而一些西部地区如陕西、西藏等欠发达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上升的趋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近年的经济增速和经济结构调整有关，例如国家加大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优化升级，严查环保使部分企业关停、违法占地查处让部分厂房拆除、楼市调控让建筑行业低迷、贸易战让部分中小企业减产减员等^④。

表7 2000—2020年我国人口区域分布比例变化 (%)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00—2005年	2005—2010年	2010—2015年	2015—2020年
东部	38.92	39.44	41.26	41.51	43.00	0.52	1.82	0.25	1.49
中部	32.93	32.53	31.70	31.41	29.84	-0.40	-0.83	-0.29	-1.57
西部	28.15	28.03	27.04	27.09	27.16	-0.12	-0.99	0.05	0.07

总之，对已经显现的变化，我们都要全面、客观地看待。这些变化是否都顺应区域均衡发展的要求，是否已经成为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转变的拐点，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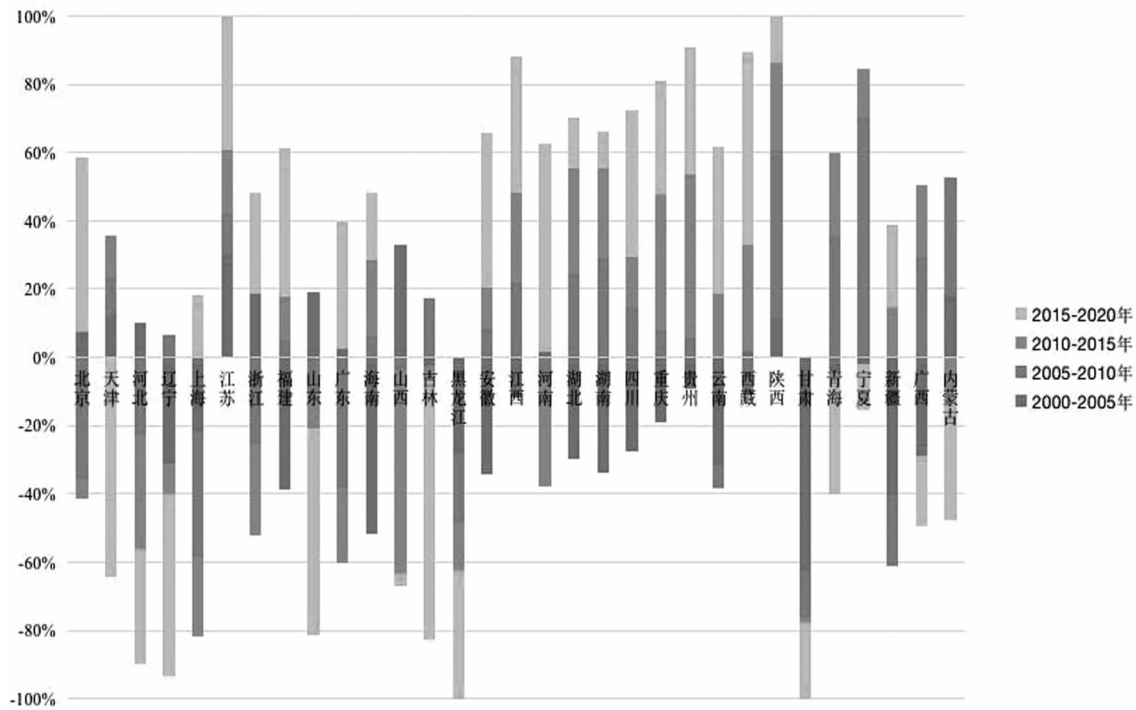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20年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变化 (%)

(三) 城镇化速度有所放缓, 但乡—城转移依然强劲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 1978年仅为17.92%, 2020年已达63.89%。从城镇人口增减及其年均增速来看, 在1990—2020年的30年间, 我国城镇人口从1990—1995年间增加的4979万人上升至2015—2020年间的13083万人, 尽管各个时期城镇人口的年均增速有所不同, 但始终保持较高的正向增长趋势, 尤其是1995—2005年的十年间城镇人口年均增速较快。参照国际经验, 城镇化率在30%—70%期间是城镇化加速时期, 当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 城镇化减速的现象将逐渐出现。我国城镇化率在2010年达到49.95%后速度明显放缓。近十年来, 我国的城镇人口增长呈现“挂锁”态势, 2010年城镇人口增量达到顶峰。此前呈现波浪式推高, 此后呈现波浪式回落, 整体趋势线缓慢向下倾斜^[12]。同时, 在农村人口增减及其年均增速方面, 在1990—1995年, 我国农村人口平均每年保持1%的增速, 但1995年以后, 农村人口各个时期的人口总量和年均增速出现大幅下滑, 特别是2015—2020年间农村人口更是保持了年均4.1%的减少速度, 这可能与我国实施的一系列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有关。

表8 1990—2020年我国农村人口的减速和城镇化率的增速

	1990— 1995年	1995— 2000年	2000— 2005年	2005— 2010年	2010— 2015年	2015— 2020年
城镇人口增减(万人)	4979	10732	10306	10766	10138	13083
城镇人口年均增速(%)	3.9	6.9	5.2	4.5	3.6	4.0
农村人口增减(万人)	1809	-5110	-6293	-7431	-6767	-9367
农村人口年均增速(%)	1.0	-1.5	-2.0	-2.6	-2.6	-4.1

当然, 对城镇化放缓也要全面看待。首先, 过去一个时期里城镇化速度快, 但质量不高, 现在城镇化速度放缓, 表明国家的政策导向已经从片面追求增速转向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第二, 人口城镇化速度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有关。近年来, 伴随国家对农村全面脱贫、农村改革与发展等工作的高度重视, 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财政支农扶农政策,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缩小, 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 其收入鸿沟的缩小效应显著优于东部地区。第三,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也是影响迁移的重要因素。从图3可以看出, 2010年以前, 农村15—64岁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高; 但2010年以后, 农村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明显下滑。

此外, 人口城镇化内在地包含着农村人口城镇化, 其速度不能只看城镇化率的提高速度, 而是更要注意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转移速度。从2000—2020年间, 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势头并没有减弱, 尽管乡城流动的人口比例持续增加, 但实际上乡城流动趋缓甚至下降^[13]。从全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净转移率(特指乡—城人口净转移量占假设时期内只有自然增长条件下时期末农村人口的比例)看, 2010年前后的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净转移率尽管有升有降, 但始终在12%左右徘徊。可见, 在农村青壮年人口明显减少的情况下, 乡—城人口转移依然强劲。其实, 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 即使乡—城人口转移强度不变, 以总人口中城镇人口占比衡量的城镇化率的提速也会放缓, 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道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 我国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一直趋于减少, 其下降速度不断加快。可以说, 农村人口城镇化转移一直是在加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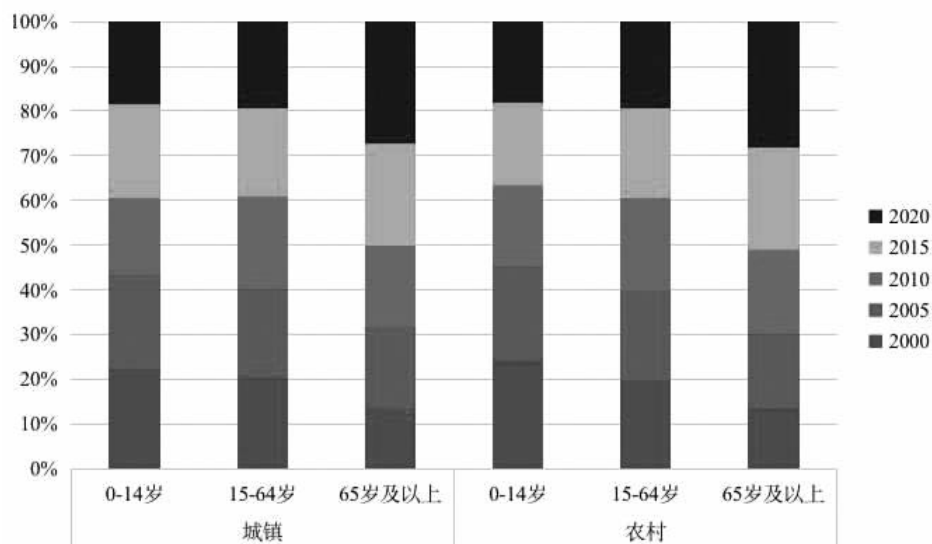


图 3 2000—2020 年城乡年龄结构变化 (%)

三、小结与讨论

(一) 我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空间格局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实现了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变。进入 21 世纪之后，东部地区率先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转型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反超东部地区，全国城乡收入差距由拉大转变为缩小。在此背景下，我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性变化。其具体表现：一是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净迁移量由改革开放头三十年的持续高增长转变为减少。二是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速度反超东部沿海地区，其城镇集聚能力有所增强，一方面减少了农村人口跨区域外流，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对外流人口返乡的吸引力。以 2010 年为时间节点，中西部向东部沿海城市长时期高强度集聚有所缓和，人口与经济区域均衡发展的趋势初露端倪。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城镇化在 2010 年之后已经从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且减速趋势持续加深。从人口角度看，城镇化减速发展的深层原因在于农村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化导致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规模和潜力渐趋下降”^[14]。其研究发现佐证了我国省际人口迁移趋势已经发生了新变化，但是否转折的拐点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区域经济逐步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转变，必然会对人口空间格局的变化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一转折性变化趋势下，人口与经济的区域均衡和非均衡发展之间将会如何互动影响、其今后的长期变化趋势将会怎样演变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 人口空间格局新变化使区域均衡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

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高度相关，人口空间格局的变化有着多方面的经济社会起因和后果。人口迁移流动的区域和城乡差别效应，将会使区域和城乡均衡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人口迁移流动的活力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迁移流动钝化，与宏观面上的经济增长放缓、产能过剩、相关制度改革滞后不无关联。农民工返乡并非都是出于主动选择，而是与原流入地的就业难度和生活成本提高等因素有关。在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空间格局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情况下，要重点关注农民工的返乡流。当我们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而鼓舞的时候，也要充分关注长期滞留大

城市和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难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调查失业率的统计范围,但是,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状况究竟如何、怎样更好地帮助他们返乡后就业创业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摆上重要日程。由于农民工返回户籍所在地以后不再属于流动人口,因此,大量返乡农民工不再进入我国流动人口跟踪调查的范围。为此,建议专门设立返乡农民工的跟踪调查。

(三) 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奠定了我国人口发展区域均衡的大格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人口空间格局的变化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的东部沿海与内地之间,而不是胡焕庸线为界的东南与西北半壁之间。与东南半壁的内部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相比,两大半壁之间的迁移流动只是“涓涓细流”。未来我国人口空间格局仍将继续保持这种趋势。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奠定了我国人口发展区域均衡的大格局,不是因为胡焕庸 80 多年前划了这条线,而是因为这条线客观科学地反映了我国两大半壁自然生态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西北半壁脆弱的自然生态地理环境对人口生存发展的直接制约作用特别强,这种特别强的制约作用并不意味着西北半壁的生态环境不可改善,而是意味着即使其生态环境得到不断改善,也不宜承载太多的人口。人口均衡分布的要义在于“均而不衡,衡而不均”。胡焕庸线东西两侧人口密度相差悬殊的现象背后,寓有区域人口与生态承载力相对平衡的内在机理。可以展望,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西北半壁的生态环境将会不断改善,其人口承载力也会有所提高,但只宜保持较低的人口密度。胡焕庸线以西保持低密度人口,既有利于西北半壁的环境水土保持与改善,为子孙后代留下胜过“金山银山”的“绿水青山”;也有利于促进在人口迁移流动的再分布过程中,缩小不同地区之间人均收入与生活水平的差距,最终实现“人的发展的均衡”。

注释:

① 本文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 11 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 8 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②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国家统计局和各省份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计算。

③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城乡人口死亡率等参数,将 2000—2020 年间四时期各地区的净迁移人口分解为城乡净转移人口(均指时期末 5 岁及以上)。这里的城乡人口净转移是指机械变动,其中包括城镇范围扩大和市镇建制增加引起的乡—城人口转移。

④ 搜狐网,农民工失业返乡为何剧增(https://www.sohu.com/a/242413730_100159124, 2018-07-20)

参考文献:

- [1] 张善余. 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模式的重大变化 [J]. 人口研究, 1990 (1): 2-8.
- [2] 王桂新, 潘泽瀚, 陆燕秋.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5): 2-13+111.
- [3] 曾明星, 吴瑞君, 张善余. 中国人口再分布新形势及其社会经济效应研究——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J]. 人口学刊, 2013, 35 (5): 15-25.
- [4] 李扬, 刘慧, 汤青. 1985—2010 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时空格局特征 [J]. 地理研究, 2015, 34 (6): 1135-1148.
- [5] 臧玉珠, 周生路, 周兵兵, 等. 1995—2010 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态势与空间格局演变——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J]. 人文地理, 2016, 31 (4): 112-118.
- [6] 段成荣, 朱宝树, 崔传义, 等. 春运与流动人口 [J]. 人口研究, 2009, 33 (1): 30-45.

- [7] 李迅雷. 人口流向逆转带来什么变化 [EB/OL]. 第一财经, (2017-04-25) [2020-06-16]. <https://www.yicai.com/news/5273028.html>
- [8] CREIS. 中国人口迁移新趋势: “3+6”格局 [EB/OL]. 搜狐网, (2019-07-27) [2020-08-16]. https://www.sohu.com/a/139268548_556842.
- [9] CREIS. 中国人口大迁移, 在2017年已发生巨大转折 [EB/OL]. 株洲新闻网, (2018-04-18) [2020-08-20]. <http://www.zznews.gov.cn/news/2018/0418/285035.shtml>
- [10] 吴瑞君, 朱宝树. 中国人口的非均衡分布与“胡焕庸线”的稳定性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6 (1): 14-24+126.
- [11] 戴宏伟. 从非均衡到均衡: 改革开放30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J]. 党政干部学刊, 2008 (12): 3-5.
- [12] 黄强. 中国近十年城镇人口增长的“挂锁”态势分析及启示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7 (2): 2-11+126.
- [13] 程梦瑶. 中国流动人口的迁移转变与多元化发展 [J]. 兰州学刊, 2021 (7): 120-132.
- [14] 何志扬, 刘昌南, 任远. 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的阶段转变及政策启示 [J]. 天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19 (2): 125-131.

The Turning Change of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Wu Ruijun / Xue Qixin / Luo Zhihua

Abstract: Based on previous censuses and relevant statistical data,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It is found that the net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from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o the eastern regions ha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since 2010, which is m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speed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eastern regions.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 China is beginning to emerge, and the new changes of population spatial pattern make reg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fac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stability of Hu's Line has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reg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in China. In the future, the changes of population spatial pattern in China will mainly occur between the eastern coast and the mainland within the southeastern half China.

Key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 Urbanization, Change of the Spatial Patterns

(责任编辑 周 巍)